

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语言接触学 =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Language Contact Studies

罗仁地 LaPolla, Randy J.

2021

罗仁地 LaPolla, R. J. (2021). 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语言接触学 =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Language Contact Studies. 汉藏语学报 Journal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12, 1-10.

<https://hdl.handle.net/10356/153277>

© 2021 The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aper was published in 汉藏语学报 Journal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and is made available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s).

Downloaded on 15 Nov 2021 12:32:00 SGT

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语言接触学

罗仁地

[提要] 语言类型学、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学之间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为三个方面都是针对语言形式的研究，三者的差别只在于着重点不一样。我们如果要了解语言的形式，就必须要了解语言形式的作用（语用/意思）和来源，包括影响形式或用法的因素，如说话者迁徙的历史以及语言（文化）接触及其影响。我们在进行类型学研究的时候，必须参照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学，而进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时候更需要参照类型学。具体讨论语言的性质和功能、历史语言学的不同方法、类型学描写范畴和比较概念的区别和用法。

[关键词] 语言学方法论、汉语、涌现现象、溯因推理法

从题目来看，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语言接触学好像是三个不同的独立研究领域，研究的是三个独立的现象，但其实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三个方面，最好是要一起讨论、一起探讨。这个整体也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行为，即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互动行为。行为就是文化，交际互动行为也是文化的一方面，跟文化其他方面没什么大不一样，即使用相同的认知功能，遵循相同的行为原则。在进行交际互动行为的时候通常使用的是语言形式，但语言形式是没有固定的系统：在交际的时候会因说话者的需要以及说话者和听话者两人之间互动行为的结果而有所变化。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语言形式是从交际互动行为涌现出来的（Hopper 2011, 2012）。所以说，形式的研究脱离不了其用法，而且没有结构主义派共时和历时之分，但有些形式，因为多次使用，会事例化（典型化—become exemplars），而事例化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就会习俗化（常规化 conventionalize）、从个人行为的角度来说，就会习惯化（habitualize）（Schmid 2015, Lehmann 2017）。比如普通话的「把」字构式，习俗化的和习惯化的不是具体的句子而是一个典型的结构：**【主要主题-把-次要主题-谓语】**（参看Thompson 1973 的典型形式：[NP1 ba NP2 V1 (V2) (NP3)] 和 LaPolla 2013a 的讨论）。我们很多行为和思维方式会变成习惯，而习惯很难改，尤其是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习惯。这就是语言接触引起的影响的主要因素（罗仁地 2005、LaPolla 2009）。

类型学（包括语言描写）研究的是已经成了习俗的事例的不同类型。每个社会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包括独特的思维方式（世界观）和交际习俗。但全球绝大多数的社会跟其他社会是会有接触的（比如双语社会），而社会与社会之间接触会互相影响，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接触的性质和两个互相接触的社会文化的相对地位而异。因此，如果要了解某社会的交际互动行为为习俗的所以然，就一定要先了解说话者社会的历史和接触情况。比如官话方言在这么大的地方（云南到黑龙江）还能基本上通话是因为扩散到边疆的地方是比较晚的事情：17世纪的时候，中国西南、东北、和长江上游的人口只是整个中国的百分之五，以及说官话的人口的百分之十，但因为清代大量的迁徙，到1982年那三个地方的人口是全国的三分之一，以及说官话的人口的二分之一（Lee & Wong 1991:55）。再比如现代英语不是 Wessex 古代英语的直接后代，而是英国不同地方和古代斯堪地那维亚人的语言（Old Norse）不同影响的结果（Emonds & Faarlund 2014, Trudgill 2016）。不懂历史和接触不能了解英语现状的所以然。

虽然语言可以分为形式和用法两方面，不过，由于语言的形式和意思来源于交际互动行为，那么，要了解所呈现的语言形式和意思，就必须先着手了解其在交际互动行为的作用。正如俗语所说的“欲知其然，必先知其所以然”。

一 语言在交际互动行为中的作用

要了解语言，就必须先了解语言在交际互动行为中的作用。我们在〈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一文中探讨了语言在交际互动行为中的作用（罗、潘 2002；另参看 LaPolla 2003,2015）。文中指出，语言交际的过程有两个环节：信息传达者的「显示传达信息意图的动作」（ostensive act；包括说话但不限于说话；以下简称「示意动作」）和信息接受者的「推测/推论」（inference）。「信息传达」这个说法有点不妥，因为交际不是一种编码解码过程，而是发话人成功地让收话人推测出他所要表达的信息。即信息不是真正地「传达」的，而是猜测的、是在听话人脑子里创造的。所用的猜测方法是溯因推理法（abductive inference,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即推测某种现象的所以然。这种推理法跟演绎法、归纳法不一样，而且是唯一的创造新信息的推理法（Peirce 1878）。这里的推测就是猜测信息传达者为什么做了该示意动作。在传达信息的时候，信息传达者总希望信息接受者能又快又准确地对自己要传达的信息做出推测，因此，信息传达者会尽量做出最适当地制约信息接受者推测过程的示意动作，以帮助对方进行推测。制约信息接受者的推测过程指的是限制信息接受者在推测过程中可能想出来的推论。

简单地举个例子：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我如果要太太把离我远点的餐巾递给我，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我有这个意图：我可以就用手指着餐巾放置的方向，让她猜测我示意动作的意图，我这种示意动作对她推测我的交际意图的制约程度非常低，她必须先猜我手指的是什么，也必须知道我在吃饭的时候有用餐巾的习惯，但是如果除了手指着餐巾以外我还同时说『餐巾』，那么这种示意动作就对她推测我的交际意图比前者有较高的制约程度（她推测出我要的是餐巾而不是茶壶就容易多了），然而我可以用更具体的示意动作，除了手指着餐巾外我还可以说：『请把餐巾递给我』。这个示意动作对她推测我的交际意图的制约程度就较前两种高。示意动作越具体，推测过程的制约程度就越高，但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确定的。推测是双向的：信息传达者在做出示意动作前也会先对信息接受者的理解能力进行推测，以便帮助他做出适当的示意动作，使对方能够比较轻松地、比较准确地对自己所做出的示意动作进行推测。

语言在交际互动行为中的作用是作为一种制约信息接受者推测过程的工具。更具体地说，语言是因为说话者要制约听话者的推测过程而发展的。比如：美国英语东南方的方言中有 y'all ‘你们’ 这种说法，这是因为标准英语的第二人称代词不分单数和复数，南方方言说话者为了制约听话者对数的推测就经常在第二人称代词 you ‘你’ 后面加 all（所有人），久而久之，这种说法就常规化而变成必用的 y'all。处于不同社会背景的说话者，由于其文化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关系，对不同语义领域进行制约，其制约程度也不一，而且制约的手段亦有不同之处。因此，每个社会所习俗化/常规化的语言形式有它的独特性而反映说话者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认知范畴（LaPolla 2015）。

二 语言类型学

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是不同语言已经成为事例而习俗化 / 常规化的形式及其功能，经过比较，先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类似之处，然后，把所发现的各种不同和类似的现象归类成系统。所讨论的类别和系统不是个别语言的具体范畴（「描写范畴」 descriptive categories），因为没有跨语言的语法范畴或构式，也没有共有的语法范畴或构式；所讨论的是抽象化的「比较概念」（comparative categories）。归纳出来的类别反映我们对语言的了解，同时从语言比较的结果，研究者可以知道哪些语义领域常常受制约，制约程度一般如何，哪些制约手段 / 方式是最常见的，哪些是比较少见或根本没看到的（我们不能说某种形式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还没看到的，如赵元任先生说的，“言有易，言无难”）。另外，类型学家还要看不同现象的地理和社会分布，尽量探讨引起不同类型的因素，比如，我们知道某个社会的人口大小和结构、文化和地理因素可以影响语言的结构（可参考 Perkins 1988、Nichols 1992、Trudgill 1997、2011、De Busser & LaPolla 2015 里所有的文章、Timofeeva & Ingham

2018 及同集的文章)。比如 Perkins (1988) 比较了 50 种社会的复杂程度及其有无前后缀形式的指示语素, 发现在复杂程度高的社会前后缀形式的指示语素比较少。Trudgill 认为语言接触的结果跟接触的性质有关系: 如果是小孩并且掌握双语, 结果是语言会更复杂, 但如果是大人学第二语言, 结果是学的语言会更简单。他认为英语越来越简单是因为大部分的学习者是大人。

在分析某一个语言的时候, 要以归纳法, 从自然的语料里归纳所呈现的范畴, 不要把事先想找的范畴硬套在语言上(参看戴、罗和汪主编 2009, 罗仁地 2007、2017)。如果所归纳出来的范畴跟别人在研究别的语言的时候归纳出来的范畴类似, 可以选择用相同的名称, 但不要认为范畴是「一样的」, 只是到某种程度是「类似的」。这个「类似的」概念就是比较概念, 而不是具体的语言范畴。¹类型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在描写语言的时候了解该语言所呈现的现象, 因为不受限于某理论框架或某种语言的影响(比如只学汉语或者英语的语法, 然后分析其他语言的时候可能会硬套汉语或者英语的范畴)。同时, 如果发现该语言的语料里呈现某种现象, 分析者就可以知道所发现的现象是常见的或是少见的, 进而可以确定该现象对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比如, 如果发现某种汉语方言呈现示证标志或者中间态标志的话, 一方面可以认得出来, 而且这是很重要的发现。语言描写的成果(比如参考语法)同时也是类型学研究的基本依据。

三 历史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研究的也是语言形式, 但着重点在形式的演变。上面说过, 语言形式是从交际者互动行为涌现出来的, 然后可能会事例化和习俗化, 就是说, 语言的所有形式都是习俗化/常规化过程的结果, 虽然如此, 习俗化的是事例, 而不是具体形式。语言形式是没有固定的系统, 因此在交际的时候会因说话者的需要以及说话者和听话者两人之间互动行为的结果而有所变化, 因为交际互动行为中的需要经常在变, 所以, 每次使用某种事例的时候, 具体的语言形式也因而可能有所改变。

语言研究者研究语言演变的目的通常可分为两种:

(一) 想构拟语言的原始形式, 通常也同时探究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

(二) 想了解语言形式的来源, 就是了解某语言是经过什么样的习俗化/常规化过程而演变成现在的样子。

目的(一)的历史语言学所研究的范围一般涵盖目的(二), 原因是, 要构拟原始形式, 要从现存的形式(经内部构拟和跟亲属方言/语言比较)推测产生现存形式习俗化/常规化的过程(语法化、词汇化和语音变化都是习俗化/常规化), 从而追溯原始的形式。

进行目的(一)历史语言学, 即构拟原始形式, 必须用自然的语料和传统的历史比较方法, 但是 20 世纪初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没有用传统的比较方法来构拟早期的汉语, 他把《切韵》的范畴当作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间的语言系统, 而是按照《切韵》(7 世

¹ 虽然类型学界的学者基本上都区分描写范畴和比较概念, 但比较概念的性质和抽象程度(即能到什么程度离开语言事实)还是有争议。可参看 LaPolta 2016, 2017b。

纪的一本韵书)的范畴填上语音形式,然后,就在这个基础上推类到古汉语。因此所弄出来的系统不是真正的构拟,不是自然语言的系统,结果,就很难进行原始汉藏语的构拟。高本汉的方法问题很多,比如罗常培、陆志韦、陈寅恪、王力、张琨都认为《切韵》不是某个地方和某个时间的语言,而是审核、综合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韵书和反切、读音传统,因此不是一个语言,没有自己的文献、语法、词汇,因此也不可能是现代方言的祖先(Norman & Coblin 1996, Coblin 2003, Norman 2012, 2014),但后来却有很多学者采用他的方法。²

好在 21 世纪语言学有越来越重视科学方法的趋势(罗仁地 2017),而历史语言学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为我们应该搜集真实的方言语料,然后用传统的比较方法进行构拟(Coblin 2003)。况且,如果不了解某语组的说话者的迁徙历史及其与其他社会的接触,就没办法了解语言的历史(LaPolla 2001, 2009, 2013b; 罗仁地 2005; Coblin 2002, 2004, 2017)。采用历史比较方法构拟出来的语言才会像个自然的语言,而且采用这种方法的话,也可以在过程中同时发现民族迁徙和接触的影响。罗杰瑞(Jerry L. Norman)和柯蔚南(W. South Coblin)多年来主张采用这种做法,他们具体着手于闽语、赣语、客家语田野调查和不同闽语方言的比较、不同赣语方言的比较和不同客家语方言的比较,而且注意迁徙的历史。他们发现不同闽方言来源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只构拟一种原始闽语(Coblin 2018)。目前主张通过田野调查和比较方法了解汉语方言的学者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沈瑞清(2018)、台北中研院语言所的吴瑞文(2014)、香港城市大学的郭必之(2016、Kwok 2018)、北京大学毕业的孙顺(2016)和张静芬(2013)、河北大学的桑宇红、中山大学的庄初升和余鹏以及他们的学生、单秀波等等。罗杰瑞和柯蔚南都认为汉语历史学以后要靠这些优秀年轻的中国学者来做这种比较踏实的研究;西方的汉语历史学越来越脱离语言的事实。形态语法调查比较以前更少;现在在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所长刘丹青,复旦大学的盛益民等积极在做方言调查和比较。中国之外还有一些日本学者采取这个做法,如滨田武志(2015)和秋谷裕幸(2017、2018)。

目的(二)的历史语言学不一定包含目的(一)的历史语言学,原因是,进行语法化研究和进行描写某种语言的学者不一定构拟具体的原始形式,他们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哪种形式可以变成另外的哪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就是了解某种形式可能是从哪些形式演变过来的。比如,在日旺语(藏缅语;缅甸北部;本人调查资料)有一个表示‘听说’的示证标志 *wā*。这个标志的形式跟动词 *wā* ‘说’的形式是一样的,加上我们从语法化研究知道表示‘听说’的示证标志常常是动词‘说’演变过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日旺语‘听说’示证标志是动词‘说’演变过来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日旺语名物化结构与关系子句结构之间的历史关系:经过研究发现日旺语和汉藏语很多其他语言目前的关系子句结构类型来自另外一种类型的演变(LaPolla 2008a,b; LaPolla 2017a)。虽然我们在描写日旺语的时候想了解形式的发展,我们不一定去构拟任何原始形式。这种研究也可以说是“历时类型学”(diachronic typology)。

² 《韵镜》也不是某语言的描写,而只是为了帮助读古书的人了解古书里的反切(Coblin 2006)。

四 历史语言学与类型学、语言接触学

历时类型学（即目的（二）的历史语言学）和共时类型学所用的方法一样，所用的理论架构也一样，所得到的知识用途也基本上一样。上面也提到了，我们写类型学论文的时候（包括描写某种语言的时候），除了把所发现的现象归类成系统之外，还尽量讨论该现象的来历或影响其类型的因素，所以类型学和历时类型学、语言接触学是分不开的。³

从历时类型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形式的变化基本上是单向的：实词可以变为虚词，虚词可以变为附属词 (clitic)，附属词可以变为语缀，语缀可以变为字形变体 (inflection)，最后也可以消失。在构拟原始形式的时候，这种知识可以帮我们选择原始形式。比如，如果我们在比较几个语言或方言的时候发现一个语言或方言的说话者用某一种虚词来制约听话者对某一种语义领域的推测，而另一个亲属语言或方言的说话者用一个有语音对应的语缀来制约该领域，有了历时类型学的知识，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推论后者是从前者演变过来的。例如芬兰语有虚词 *kerä* ‘跟’，而爱沙尼亚语 (Estonian) 有表跟从格后缀 *-ke*（见于 Comrie 2001:31），有了历时类型学的基础，我们在构拟原始语言制约该语义领域的形式的时候，就可以认定该形式应该是虚词而不是语缀。

此外，类型学的“标记性” (markedness) 概念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形态系统的发展。比如，可以辅佐我们了解某一种多功能的形态形式的不同用法的发展途径。比如，独龙语里有一种表示反身状况、中间 (middle voice) 状况、和状态化等三种功能的动词后缀。从标记性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形式最初可能只有标记反身状况的作用，然后逐渐由语义的引申扩散到中间状况，而由于中间状况的语义特点又被引申到状态化的作用（详情请看罗仁地、杨将领 1996/2004）。又比如汉藏语系很多语言有多功能的语义角色标志，比如，一个助词可以表示工具、施事者、方法状语和起点。标记性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推测这样的多功能助词可能最初是起点助词，然后起点引申到工具，然后引申到方法状语，然后引申到施事者标志（详情请看 LaPolla 1995、2004）。

虽然类型学跟历时类型学（目的（二）的历史语言学）有密切的关系，而历时类型学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构拟的工作，然而，类型学和探讨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的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在探讨几个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的时候，不能用类型特征的相似来作为确定亲属关系的依据（参看 Egerod 1980, Greenberg 2001）。比如 Chirkova (2012) 认为羌语支不是一个有亲属关系的语组，因为建立羌语支所用的特征都是类型特征而不是亲属特征，只能说是语言区域现象。确定亲属关系的依据应该是有同源关系的形态系统，形式一定要有严格的对应，而不只是相似的系统，也不是一、两个形态形式的对应，而是成套的形式 (paradigm)。只有这样才可以减少把偶然出现的相似特征和借来的形式作为确定亲属关系的依据之类的错误。这就是传统印欧语系学者确定语言间亲属关系的依据标准（见 Nichols 1996；另参看 Campbell 2003a, 2003b、LaPolla 2012, 2013b）。

³ 这也还是有争议：Dryer (2006) 认为在描写语言的时候不需要解释所描写的形式的来源，而且，认为在做类型学比较的时候不需要讨论形式的所以然。可参看 LaPolla 2017b。

有些进行原始语言构拟的学者也试图用类型学的另一种知识来帮他们作构拟工作。简单地举个例子：被大部分印欧语系专家所接受的原始印欧语语音系统包括清塞音、浊塞音和送气浊塞音，可是其中没有送气清塞音。Jakobson(1957) 对这种语音系统的说法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的语音系统，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因为有送气浊塞音的语言不可能没有送气清塞音。他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语言。因为有这样的意见，后来有人提出另外一种构拟方式，这种方式叫做“喉音学说”(Glottalic Theory; 比如 Gramkrelidze & Ivanov 1973, Hopper 1973): 认为原始印欧语语音系统包括清塞音、喉塞化清塞音和浊塞音。他们说这样的语音系统在世界上的语言中可以找到，所以比传统的构拟方式好。支持喉音学说的人说他们是以类型学为依据来把构拟工作做得更科学。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描写的语言只不过是世界所有语言的十二分之一，而且，类型学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形式是不可能的，只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形式在我们所知道的语言中是比较常见的，什么样的形式是比较少见的或者还没看到。七十、八十年代就发现一些有送气浊塞音而没有送气清塞音的语言(比如南岛语系的 Kelabit 语[Blust 1974],和 Niger-Congo 语系的 Mbatto 语[Stewart 1989]), 所以提出喉音学说的动机就消失了。(有些研究词序的类型学家也出了类似的问题; 详情看 LaPolla 2002。)

五 结语

总的来说，语言类型学、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学之间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为三个方面都是针对语言形式的研究，三者的差别只在于着重点不一样。我们如果要了解语言的形式，就必须要了解语言形式的作用(语用/意思)和来源，包括影响形式或用法的因素，如说话者迁徙的历史以及语言(文化)接触及其影响。我们在进行类型学研究的时候，必须参照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学，而进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时候更需要参照类型学。

参考文献

- 戴庆厦、罗仁地、汪锋主编：《到田野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9年。
- 郭必之：《大田前路话在闽语中的位置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载《边界方言语音与音系演论集》，中西书局，2016年。
- 罗仁地：《第二语言习得对第一语言的影响》，载戴庆厦、贾益民主编《第四届国际双语学研讨会论文集》，50-57。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 罗仁地：《语言类型学 / 功能语言学派视野下的语言学田野调查》，载《语言学论丛》第三十六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2-56页。(另载于戴庆厦、罗仁地、汪锋主编《到田野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9。)
- 罗仁地：《尊重语言事实 提倡科学方法——21世纪语言学刍议》。《光明日报》2017.12.03, 12版。
- 罗仁地、潘露莉：《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中国语文》2002年第3期，第203-209页
- 罗仁地、杨将领：《独龙语 / 日旺语动词的返身态和中间态标志》，戴庆厦等编，《中国民族语言论丛(1)》，13-34。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 秋谷裕幸：《中原官话汾河片音韵史研究》。神戸市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 秋谷裕幸：《闽东区宁德方言音韵史研究》，《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系列的第60本，中研院语言所，2018年。

- 沈瑞清:《黄坑话与早期闽北语》,第二届李方桂青年学者研讨会论文,中研院语言所,2018年7月12-14日。
- 孙顺:《原始闽北语的重新构拟及演变》,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 吴瑞文:《从比较闽语的观点论南朝江东方言齐韵的拟测》,《东方语言学》2014年第十四辑,第60-80页。
- 张静芬:《闽南方言的历史比较及语音构拟》,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 郑至君:《陆丰闽南语的归属》,《东方语言学》第十六辑,2017年。
- 郑至君、郭必之:《粤东闽南语的分群》,《语言学论丛》第五十六辑,2017年。
- 郑至君、郭必之:《原始闽语鼻音声母的构拟问题》,丁邦新、张洪年、邓思颖、钱志安编辑,《汉语研究的新貌:方言、语法与文献——献给余霭芹教授》,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2016年。
- 濱田武志:《粵語·桂南平話の共通祖語と系統關係》,东京大学文学院博士论文,2015年。
- Blust, Robert A. 1974. A double counter-universal in Kelabit. *Hawaii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5.5:49-56.
- Campbell, Lyle. 2003a. How to show languages are related: Methods for distant genetic relationship.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Brian D. Joseph & Richard D. Janda, 262-282. Oxford: Blackwell.
- Campbell, Lyle. 2003b. Beyo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001*, ed. by Barry J. Blake & Kate Burridge, 33-57.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 Chirkova, Katia. 2012. The Qiangic subgroup from an are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s of Muli.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1: 133-170.
- Coblin, W. South. 2002. Migration history and dialect development in the lower Yangtze watershe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5.3: 529-543.
- Coblin, W. South. 2003. The Chieh-yunn system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3.2: 377-383.
- Coblin, W. South. 2004. The Huang-Xiao dialects in the light of migration history. 载于董琨、冯蒸主编,《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
- Coblin, W. South. 2006. Zhāng Línzhī on the Yùnjīng. *The Chinese rime tables: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comparative phonology*, ed. by David Prager Branner, 123-149.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oblin, W. South. 2015. *A study of comparative Gà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58).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Coblin, W. South. 2019. Neo-Hakka, Paleo-Hakka, and Early Southern Highlands Chinese. 《语言研究集刊》第21集, 175-238。
- Coblin, W. South. 2019. Convergence as a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of a controversial Common Min phonological configuration (Revised version). 《语言研究集刊》第21集, 79-122。
- Coblin, W. South. 2019. *Common Neo-Hakka: A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6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Comrie, Bernard. 2001. Typ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Aspects of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Studia typologica, 1)*, ed. by Walter Bisang, 21-35. Berlin: Akademie Verlag.
- De Busser, Rik & Randy J. LaPolla, eds. 2015.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Dryer, Matthew S. 2006. Descriptive theories, explanatory theories, and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Catching language: Issues in grammar writing*, ed. by Felix Ameka, Alan Dench, and Nicholas Evans, 207-23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Egerod, Søren. 1980. To what extent can genetic-comparative classifications be based on typological considerations? *Typology and Genetics of Language* (T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Copenhague XX), ed. by Torben Thrane, Vibeke Winge, Lachlan Mackenzie, Una Canger, and Niels Ege, 115-138. Copenhagen: The Linguistic Circle of Copenhagen.
- Emonds, Joseph Embley & Jan Terje Faarlund. 2014. English: *The Language of the Vikings*.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 Palacky University, Olomouc.
- Gamkrelidze, Thomas V. and Vjacheslav V. Ivanov. 1973. Sprachtypologie und die Rekonstruktion der gemeinindogermanischen Verschlüsse. *Phonetica* 27: 150-156.
- Greenberg, Joseph H. 2001. The methods and purposes of linguistic genetic classifica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 111-135.
- Hopper, Paul J. 1973. Glottalized and murmured occlusives in Indo-European. *Glossa* 7: 141-166.
- Hopper, Paul J. 2011. Emergent grammar and temporality i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Constructions: Emerging and Emergent*, ed. by P. Auer & S. Pfänder, 22-44.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Hopper, Paul J. 2012. Emergent grammar.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ed. by James Paul Gee & Michael Handford, 301-31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Jakobson, Roman. 1957. Typological stud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ed. by Eva Siversten, et al., 17-25. Oslo: Oslo University Press.
- Kwok, Bit Chee (郭必之). 2018. *Southern Min: Comparative phonology and subgroup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LaPolla, Randy J. 1995. On the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systems.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4: 1149-1186.
- LaPolla, Randy J. 2001.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Case studies in language change*, ed. by R. M. W. Dixon & A. Y. Aikhenvald, 225-2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翻译 (沈瑞清译) 载于《东方语言学》第九辑 (2011.1): 84-107.
- LaPolla, Randy J. 2002. Problems of methodology and explanation in word order universals research. 《东方语言与文化》, 潘悟云主编, 204-237.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 LaPolla, Randy J. 2003. Why languages differ: Vari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ference.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ed. by David Bradley, Randy J. LaPolla, Boyd Michailovsky & Graham Thurgood, 113-144.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 LaPolla, Randy J. 2004. On nominal relational morphology in Tibeto-Burman.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 by Ying-jin Lin, Fang-min Hsu, Chun-chih Lee, Jackson T.-S. Sun, Hsiu-fang Yang, and Dah-an Ho, 43-74.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LaPolla, Randy J. 2008a. Nominalization in Rawa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2:45-66.
- LaPolla, Randy J. 2008b.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s in the Rawang languag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4:797-812.
- LaPolla, Randy J. 2009. Causes and effects of substratum, superstratum and adstratum influence, with reference to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75)*, ed. by Yasuhiko Nagano, 227-237.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LaPolla, Randy J. 2013a. Arguments for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Huma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ed. by Tseng Chiu-yu, 33-57. Taiwa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LaPolla, Randy J. 2013b. Subgrouping in Tibeto-Burman: Can an individual-identifying standard be developed? How do we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s and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contingency*, ed. by Balthasar Bickel, Lenore A. Grenoble, David A. Peterson, & Alan Timberlake, 463-474.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 LaPolla, Randy J. 2015.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 cultural connection for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ed. by Rik De Busser & Randy J. LaPolla, 33-4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2016. On categorization: Stick to the facts of the 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20.2: 365-375.
- LaPolla, Randy J. 2017a. Noun-modifying clause construction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Noun-modifying clause constructions in languages of Eurasia: Reshaping theoretic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ed. by Yoshiko Matsumoto, Bernard Comrie, & Peter Sells, 91-103.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 LaPolla, Randy J. 2017b. Causation as a factor and goal in typological comparisons. *Linguistic Typology* 21.3: 547-554.
- LaPolla, Randy J. & Dory Poa. 2006. Describing word order. *Catching language: The standing challenge of grammar writing*, ed. by Felix Ameka, Alan Dench, & Nicholas Evans, 269-295.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aPolla, Randy J. & Yang Jiangling. 2005. Reflexive and middle marking in Dulong-Rawang. *Himalayan Linguistics* 2: 1-13.
- Lee, James & Wong Bin. 1991.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Qing China and their linguistic legacy.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CL Monograph Series, No. 3)*, ed. by William S-Y. Wang, 52-77.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Lehmann, Christian. 2017. Grammaticalization and automation. *JournaLIPP* 5: 33-48.
- Norman, Jerry L. 2012. A last bequest to the field. (email to W. S. Coblin & A. Schuessler June 18, 2012). ms.
- Norman, Jerry L. 2014. A model for Chinese dialect evolution. In (eds.), *Studies i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Dialect, phonology, transcription and text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53)*, ed. by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 Newell Ann Van Auken, 1-26.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Norman, Jerry L. & W. South Coblin. 1995.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4: 576-584.
- Nichols, Johanna. 1992.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space and ti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ichols, Johanna. 1996.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s heuristic. *The comparative method reviewed*, ed. by Mark Durie & Malcolm Ross, 39-7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irce, Charles S. 1878. Deduction, Induction, and Hypothesis. Reprint of 1998,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2, 186-199.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Perkins, Revere. 1988. The covariation of culture and grammar. *Studies in syntactic typology*, ed. by Michael Hammond, Edith A. Moravcsik, and Jessica R. Wirth, 359-377. Amsterdam: Benjamins Pub. Co.
- Schmid, Hans-Jörg. 2015. A blueprint for the Entrenchment-and-Conventionalization Model. *Yearbook of the Germa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3:3-25.
- Stewart, John M. 1989. Kwa. *The Niger-Congo languages*, ed. by John Bendor-Samuel, 217-245.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and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Timofeeva, Olga & Richard Ingham. 2018. Special issue on mechanisms of French contact influence in Middle English: diffusion and maintenanc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2: 197-205.

- Thompson, Sandra A. 1973. Transitivity and some problems with the *bǎ*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208-221.
- Trudgill, Peter. 1997. Typology and sociolinguistics: Linguistic structure, social structure and explanatory comparative dialectology. *Folia Linguistica* 31.3-4: 349-360.
- Trudgill, Peter. 2011. *Sociolinguistic typology: Social determinants of linguistic complex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udgill, Peter. 2016. Norsified English or Anglicized Norse? *Language Dynamics and Change* 6: 46-48.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Language Contact Studies

Randy J. LaPoll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language contact studies. It argues that to study the structures of languages, one needs to take all of these aspects, plus the history and society of the speakers of the languages, into account. It also discusses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s emergent out of interactive communicative behavior, and how that affect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ructure as a dynamic phenomenon, not a fixed system. In terms of typolog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scriptive categories and comparative concepts and their use is discuss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 divided into two types, genetic linguistics and reconstruction vs. historical typology (grammaticalizat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 study of Sinitic varieties should be based on natural data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rather than on the phil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rhyme-book categories. Examples are given of how the study of these three different aspects can inform each other.

Keywords: methodology in linguistics, Sinitic varieties, emergent grammar, abductive inference

(通信地址: 639818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48 Nanyang Ave., HSS-03-45
Singapore 639818)